

沫若文集
第十六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692 字数 24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frac{15}{16}$ 插页 3
196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4)2.25元

第十六卷說明

本卷收入《青銅時代》与研究《石鼓文》的著作及其它学术論文共八篇。

《青銅時代》輯收研究先秦社会和学术思想的論文十二篇，四篇是 1934 年迄 1937 年的作品，余八篇作于 1943 年至 1945 年，曾于 1945 年由文治出版社出版（其中九篇并由东南出版社收入同年出版的《先秦學說述林》）；1954 年人民出版社改排出版；1957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新一版。現在系根据科学出版社 1961 年第四次印刷本編入。

《“石鼓文”研究》一书，初版于 1939 年，商务印书館印行；1955 年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这里根据人民出版社版本选收两篇及其《重印弁言》。《熹平石經“魯詩”殘石》一篇，选自 1933 年由日本文求堂印行的《古代銘刻彙考》。《“格物”解》、《“考工記”的年代与国別》、《“詛楚文”考釋》、《“行氣銘”釋文》等四篇，系自《天地玄黃》中抽出，經作者校閱后編入本卷。

本卷全部注釋均为作者原注。



110 [10]

第十六卷 目录

青銅時代

序	3
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5
《周易》之制作时代	68
由周代农事詩論到周代社会	97
駁《說儒》	127
墨子的思想	156
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論	181
述吳起	200
老聃、关尹、環淵	228
宋餅尹文遺著考	241
《韓非子·初見秦篇》发微	267
秦楚之际的儒者	279
青銅器时代	292
附 录	
《两周金文辞大系》序	305
周代彝銘进化观	309

彝器形象学試探	313
后記	321

《石鼓文》研究

《石鼓文》研究	331
再論《石鼓文》之年代	344
《“石鼓文”研究》重印弁言	361
熹平石經《魯詩》殘石	367
“格物”解	373
《考工記》的年代与国別	381
《詛楚文》考釋	386
《行氣銘》釋文	406

青 銅 时 代

序

我把十年来关于秦前社会和学术思想的研究文字收集成为两个集子：一个是这儿呈献出的《青銅时代》，另一个是她的姊妹篇《十批判书》。本来是想分成内外篇集为一部的，为出版的关系，把它們分开了。

《十批判书》的內容，如名目所示，偏于批評。本集則偏于考证。两者相輔相成的地方很多，因此我很願意自行推荐：讀过本集的朋友請閱讀后集。

本集所收文字，有的在写作年代上相隔了十年，見解便不免有些出入。在这样的場合自当以年代較晚者为准。不过出入处也很有限，并且无关宏旨，所以我也就沒有加以改动，以显示十年来的自己的履迹。

附录三篇关于青銅器的文字，是从《两周金文辞大系》和《古代銘刻彙考》等书摘录下来的，藉以表示我研究青銅器的方法和收获。那些书都是在日本印行的，國內流傳者甚少，我便把它們摘录了下来。因为是文言，有点不倫不类，故把它們作为附录。

关于彝器形象的研究，沒有插图是不容易明了的。这件事在目前不容易办到。回国以来在这抗日战争的七八年

中，我也把这方面的研究完全抛荒了。即如《彝器形象學試探》一文本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中《图編》的序說，我自己手中无书，七八年来不曾和它見面了。这一次承李可染兄为我从艺专的图书馆中抄寄了来，閱之恍有隔世之感。但这种研究在目前抛棄了，我也并不感觉可惜，将来时局稳定，政治上了軌道之后，总会有人順暢地繼續下去的。

郭沫若 1945年2月11

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

生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在古代研究上对于資料的缺乏，已經在发着浩叹。他說：“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夏、殷距孔子时未远，已无十足的文献可徵，但在孔子以后的礼家，对于夏礼殷礼却言之头头是道，甚至如唐、虞揖让，君臣賡歌，其表現在《典》、《謨》上的儼然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这是表明了七十子的后学，在求学的态度上远不如其先师之有客观的精神。在現今傳存的《尚書》中，所謂《虞書》和《夏書》都是战国时的儒者假造的，已經成为了定論。就是《商書》，除掉殷末的几篇而外，也都大有问题——这个問題我在本节中要附带加以解决。照現在由地下发掘及古器物古文字学上所得来的知識而論，大抵殷商以前还是石器时代，究竟有沒有文字还是問題，《周書》上的周初的几篇文章，如《多士》、如《多方》、如《立政》，都以夏、殷相提并論，夏以前的事情全沒有說到。就是說到夏、殷上来在詳略上也大有悬殊，

夏代只是籠統地說一个大概，商代則进論到它的比較具体的事迹。尤其是《无逸》与《君奭》两篇，叙殷代的史事，頗為詳細，而于夏代则絕口不提。可見夏朝在周初时都是傳說时代，而殷朝才是有史时代的。《多士》上周公的一句話也說得很明白，便是“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与册是用文字写出来的史录，只有殷的先人才有，足見得殷之前是没有的了。单是根据這項周初的紀錄，我們要断定夏代还是傳說时代，可說是不成問題的。断定夏代是傳說时代，并不是說夏代沒有。有是有的，不过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傳下来的史影。凡是傳說，在時間的經過中是要受着多量的粉飾的，特別是夏代还有杞国那样的后裔存在，在后来文化进展了的时候要把自己的祖先粉飾起来，那是毫不足怪的。孔子所說的“文献不足”的話，大約也就是可信賴的資料不足。而周末、秦、汉的儒者和礼家也就是把那些不可信賴的資料当成了信史，所以說起古礼古事来比周公、孔子更詳。然而要說他們全无根据，他們也是多少有点根据的，所以也能博得一部分人的相信。

但关于殷代，我們却是很幸运，我們得到了一大批恐怕連孔子也不會見过的殷代太史太卜們所留下来的紀錄。那便是自一八九八年以來由安阳小屯出土的在龟甲兽骨上契刻着的殷代卜辞。那項資料在初本是出于偶然的发现，是安阳的农民胡乱地挖出来的东西。有一部分很慎重的学者对于它取着怀疑的甚至否认的态度。但近几年来由于有計劃的发掘，已經把地层的关系弄得相当明了，尤其是关

于卜辞本身的研究已达到能够断代的地步，便是那一片骨版是殷王的那一代卜的都可以知道了。对于这项资料到了现在还要怀疑或否认，那和前几年的一般人把龟甲兽骨当成“龙骨”，拿来做药品的态度，是同样的不足取。因为那是恰好该当着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

卜辞是卜的纪录，殷人最为迷信，无论什么大小的事情都要卜，一卜总是要连问多次。卜的资料主要是使用龟的腹甲和牛的肩胛骨，所卜的日期和事件便纪录在兆的旁边。有时连卜的人和所在的地方都记载上去。有时更纪录着所卜的效应，便是在卜之后若干日期果然效验了的事情。那种效验有在一百七十九日^①以后的，有那样长远的日期，可以说每一卜都是不会失掉时效的。据此可以想见殷人是怎样的迷信了。但是殷人之所以要卜，是嫌自己的力量微薄不能判定一件行事的吉凶，要仰求比自己更伟大的一种力量来做顾问。那个顾问是什么呢？龟甲兽骨只是用来传达那位顾问的意旨的工具，并不是直接乞灵于龟甲兽骨。因为殷人把龟甲兽骨用过之后便拿来毁弃，这在殷墟的地层中是表现得很明白的，殷人并没有直接以龟甲兽骨为灵。卜这项行为之成分是卜问者的人加卜问的工具龟甲兽骨加被卜问者的一位比帝王的力量更大的顾问。这位顾问如果没有，则卜的行为便不能成立。这位顾问是谁呢？据《周书》的《大诰》上看来，我们知道是天。

于(粤)天降威，用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天休于

① 《卜辞通纂》第七八八片。

文王兴我小邦周，文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周代的文化都是由殷人傳來的，據此我們知道殷人所卜問的對象也一定是天，便是在殷墟時代的殷民族中至上神的觀念是已經有了的。這在卜辭本身也有它的十足的證明。

(一) 帝隹(唯)癸其雨。(《卜辭通纂》三六四片，下略稱“卜”。)

(天老爺在癸的一天要下雨。)

(二) 今二月帝不令雨。“卜”三六五)

(在這二月里天老爺不會下雨。)

(三) 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 (“卜”三六三)

(天老爺要下雨來使年辰好嗎？天老爺要下雨使年辰不好嗎？)

(四) 帝其降堇(饁)? (“卜”三七一)

(天老爺要降下飢餓嗎？)

(五) 伐吉方，帝受(授)我又(佑)? (“卜”三六六)

(要出兵征伐吉國，天老爺肯給我們以保佑嗎？)

(六) 勿伐吉，帝不我其受(授)又(佑)。(同上)

(不要出兵征伐吉國，天老爺不會給我們以保佑。)

(七) 王封邑，帝若。“卜”三七三及三七四)

(國王要建都城，天老爺答應了。)

(八) 我其已勞，乍(則)帝降若。

我勿已勞，乍(則)帝降不若。“卜”三六七)

(我要免勞的職，天老爺是答應的。我不免勞的職，天老爺是不會答應的。)

这几条是比较上文字完整而意义明白的纪录，大抵都是武丁时的卜辞。这儿的“帝”自然是至上神无疑。凡是《诗》、《书》、彝铭中所称的“帝”都是指的天帝或上帝，卜辞中也有一例称“上帝”的^①，惜乎上下的文字残缺，整个的辞句不明，但由字迹上看来是帝乙时代的东西。大抵殷代对于至上神的称号，到晚年来在“帝”上是加了一个“上”字的。上下本是相对的文字，有“上帝”一定已有“下帝”，殷末的二王称“帝乙”“帝辛”，卜辞有“文武帝”的称号，大約是帝乙对于其父文丁的追称，又有“帝甲”当是祖甲，可見帝的称号在殷代末年已由天帝兼摄到了人王上来了。

在这儿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現象，便是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决不曾称之为天。天字本来是有的，如像大戊称为“天戊”，大邑商称为“天邑商”，都是把天当为了大字的同义語。天者顛也，在卜辞作𡇗，在周初的金文如《大豐簋》作𡇗，《大孟鼎》作𡇗，都是画一个人形，特別显示着有巨大的头脑。那头脑便是顛，便是天。顛字是后起的。因为头脑在人体的最高处，故凡高处都称之为顛，树頂称顛，山頂称顛，日月星辰所运行着的最高的地方称天。天字被太空所独占了，又才有顛字出来，連山顛也都另外造出了一个顛字。天字在初本沒有什么神秘的意思，連《說文》所說的“从一大”，都是臆說。卜辞既不称至上神为天，那么至上神称天的办法一定是后起的，至少当得在

① 《卜辞通纂》第三六八片。原文二字合书，故知确是“上帝”。

武丁以后。我們可以拿这来做一个标准，凡是殷代的旧有的典籍如果有对至上神称天的地方，都是不能信任的东西。那样的典籍在《詩經》中有《商頌》，在《尚書》中有《商书》。《商頌》本是春秋中叶宋人做的东西，在《史記·宋世家》中是有明文的，因为宋字本是商的音变，春秋时的宋人也自称商，如《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子魚言“天之棄商久矣”，便是例证。故尔宋人做的頌也可以称为《商頌》。至于《商书》在現今还有人在整个地坚信着是商代的古书，这是應該加以討論的。我現在就檢《今文尚書》所有的几篇以及散見于各种古籍的真《古文尚書》的佚文，凡有关于天的說話引列在下边。

《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

(《史記·宋世家》作“天篤下菑，亡殷國”。)

《西伯戡黎》：“天既訖我殷命。……天棄我。……天曷不降威？……我生不有命在天？……責命于天。”

(《史記·殷本紀》及《宋世家》所引大抵相同，无末句。)

《高宗肅日》：“惟天監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付命正厥德。……王司敬民，罔非天胤。”

(参照《殷本紀》訂正。)

《盘庚上》：“先王有服恪謹天命。……罔知天之断命。……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盘庚中》：“予迓續乃命于天。”

《盘庚下》：“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

《湯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太甲》佚文：“顧諟天之明命。”（《禮記·大學》）

《太甲》佚文：“天作孽猶可違〔也〕，自作孽不可活〔道〕。”
（《孟子·公孫丑》及《禮記·緇衣》）

《伊訓》佚文：“天誅造攻自牧宮。”（《孟子·萬章》）

《仲虺之告》佚文：“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曾（憎），用爽（喪）厥師。”（《墨子·非命下》〔《上》《中》文稍異〕）

《湯誥》佚文：“惟予小子屢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墨子·兼愛下》）

（《論語·堯曰篇》作“予小子屢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以上十二項都有“天”或“上帝”的稱呼，除掉《微子》和《西伯戡黎》的兩篇是在卜辭的年代範圍以外，其余的都是不能相信的。《高宗肅日》據《史記》是作于祖庚時代，在武丁之后，稱帝為天庸或有之。但那種以民為本的觀念，特別是“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國王應該尊重老百姓，沒有一人不是天的兒子）的說法，在古時是不能夠有的。民在周人本是和奴隸相等的名詞，卜辭中沒有見到民字以及从民的字。《高宗肅日》一篇也是不可信的。

此外還有《洪范》的一篇，《左傳》三引其文以為“商書”^①，《說文》六引其文亦以為“商書”^②。《漢書·儒林傳》言“遷書在《堯典》、《禹貢》、《洪范》、《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洪范》列在《微子》之前，可見班固也是認《洪

① 文五年、成六年、襄三年。

② 壴、殫、攷、圖、鉤、無，諸字下。

范》为商书的。但《洪范》那篇文章其实是子思氏之儒所作的，其出世的时期在《墨子》之后和《呂氏春秋》之前。《墨子·兼爱下》引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这分明是《洪范》中語，而称为“周詩”，可見在墨子及其弟子們的时代，《洪范》还没有出世。《洪范》根本是一篇尊重神权的宗教論文，并托始于禹，在以继承禹道自任的宗教家墨子，不应不多事徵引，且偶一引用之反諛其名。但到了《呂氏春秋》便不同了，《孟春紀》的《貴公篇》上說：

《鴻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蕩蕩。无偏无頗，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

語次虽然和現傳的《洪范》依然不同，但《洪范》的名称已經出現了。《韓非子·有度篇》也有所徵引：

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毋或作惡，从王之路。

这也分明是《洪范》中的話，但字句稍有不同，而引作“先王之法”。《有度篇》論到荆、魏等国之亡，事在韓非死后，可知本非韓非所作。作者殆秦、汉間人，已經把《洪范》当成为信史了。要之《洪范》是子思子之徒著的，本文在后面还別有证明。

由上所論足見殷时代是已經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大約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因为天的称謂在周初的《周书》中已經屢見，在周初彝銘如《大豐簋》和《大盂鼎》上也是屢見，那是因襲了殷末